

中东地区人权状况十年概述: 1984—1994^{*}

(埃及) 汉尼·梅加利 著 汪长明 译

1. 福特基金会 开罗办事处 , 开罗 2344; 2. 上海交通大学 钱学森图书馆 , 上海 200030

摘 要: 在全球语境下 , 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显性特征。作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的中东地区 , 由于历史、地缘及国际政治因素 , 使得该地区存在着程度不等的人权问题。文章作者以个案分析的形式 , 对 1984—1994 年间的该地区人权状况进行综合考察 , 认为该地区部分国家在政治民主化进程及与之相对应的人权纪录上有改善 , 但基于普遍存在的政治伊斯兰现象 , 地区人权状况的结构性转向尚需时日继续观察。

关键词: 中东地区; 人权状况; 政治伊斯兰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672—464X(2011)03—4—07

Human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An Overview from 1984 to 1994

HANNY Megally WANG Chang - ming

1. Cairo Office of Ford Foundation , Cairo 2344 , Egypt;

2. Qian Xuesen Library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30 , China

Abstract: Through case analysis , the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1984 to 1994.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corresponding human rights records have improved in some countries , but because of the common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his area , the complete change of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structural is still need to continue to watch.

Keywords: Middle East; Human rights situation; Political Islam

《国际人权公约》在致力于保护和促进人权及基本自由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 而《联合国人权宣言》(UN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中旨在防止各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各项条款只是规定了其基本职责。遗憾的是 , 对人权的侵犯几乎每天都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发生 , 也包括中东地区。

我们的讨论将涉及哪些侵犯人权的类型呢? 为方便起见 , 如果我们将关注的重点限定在公民权

^{*} 原文题名及出处: "Human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An Overview of the Last Decade ," in Human Rights: Egypt and the Arab World(Cairo Paper in Social Science) 17 , Monograph 3(Fall 1994) , pp. 7 - 14. 作者汉尼·梅加利(Hanny Megally) 曾任人权观察组织中东和北非分部执行主任(1997 - 2003) , 时为福特基金会开罗办事处项目官员(Program Officer , Ford Foundation , Cairo , Egypt , 1994—1997) ——译者。包括《国际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 UDHR , 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 ICCPR)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 ICESCR) 。后两项公约均由 196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上述三份文件确立了人权的基本标准 , 是 50 多项联合国协定、宣言、规则和规范制定的基础。本文所指中东包括从摩洛哥到伊朗之间的所有该地区国家。

利和政治权利方面,对反映那些该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在警察局、监狱以及秘密的特别拘押中心(special detention camp)每天都会发生的诸如折磨以及其他形式的残忍、非人道,并且带有侮辱性质的虐待行为来说将是恰当的。在那些地方,为迫使犯人或被拘押者认罪,拷打或其他形式的惩罚是司空见惯的。常见的折磨手段包括踢犯人的脚掌,或用各种器具击打其身体、吊在电线杆上、用烟头烫伤身体的敏感部位、电击等。

在早年的巴勒斯坦起义地区,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成了以色列占领区的安全部队对其实施惩罚性毒打的受害者,他们的身体受到严重伤害。1987年10月,人权组织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发表了一份关于叙利亚人权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列举了几年来通过采访受害者得出的38种折磨和虐待行为。在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一些海湾国家,人们常常遭受鞭笞,或者被砍断手掌、手指或大腿等形式的惩罚。多年来,由于折磨等屡见不鲜的虐待以及因令人震惊的拘押状况而致死的事件时有发生。在摩洛哥的Tazmamart秘密监狱关押着61名犯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缺少医疗保障,自1973年以来,关押的61人中至少已有30人死亡。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整个中东地区有数以万计的人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就被处决,是政府执行或操纵了这样的判决。许多人成了诸如1988年在伊拉克的哈拉卜贾、1982年在叙利亚的哈马,以及1982年在黎巴嫩的萨布拉和查迪拉发生的屠杀事件的受害者。在阿尔及利亚,1991年6月至7月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有50多人遭到杀害。有迹象表明,有的受害者是在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对安全部队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仅仅是因为触犯了宵禁的规定而遭到杀害的。在过去的一年里,包括儿童在内的120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人杀害,这种不可饶恕的杀戮行为通常是得到(以色列政府)默认的。有报道指出,同一时期,在以色列的邻国黎巴嫩,叙利亚部队在战胜了奥恩将军的部队后,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就处决了200多人。据报道,在其中的一次事件中,叙利亚部队将俘虏的30名黎巴嫩士兵扒光衣服、捆绑并列队射杀,以报复其士兵遭伏击身亡。

政治反对派因反对政府而遭到刺杀是不受地域限制的,而且往往延伸到了国外。在利比亚,从1980年开始实施一项名为“从肉体上消灭敌人”(destroy the enemy physically)的命令,导致随后至少十多个生活在英国、联邦德国、美国、意大利和黎巴嫩的利比亚公民遭到杀害或受伤。同一年,有报道指出,叙利亚政府幕后策划了发生在巴黎和巴塞罗那的暗杀其杰出政治领导人的行动。1991年,在瑞士、土耳其和法国发生了刺杀伊朗政治领导人的事件,这些人成了伊朗实施法外处决的受害者。这一年还有其他试图暗杀伊朗流亡者的报道。

在今天的中东地区,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消失或失踪。

在伊拉克1988年采取的一项行动——“安法尔行动”(Operations Anfal)中,数以万计的库尔德人在遭到拘押后“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在黎巴嫩,1975年至1983年间遭黎巴嫩国民卫队绑架和拘押的2000多人的命运仍前途未卜。在摩洛哥,虽然1991年有成百上千的“失踪者”获得了释放,但他们

中有些人被关押时间长达 18 年,一直没有得到审判。而对 1973 年至 1987 年间“失踪”的数以百计的摩洛哥人和撒哈拉人来说,他们的命运至今还是个未知数。在过去的 25 年时间里,在前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及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失踪”的 1000 多也门人的命运也还是不得而知。

在过去的十年里,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政治犯遭到逮捕。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不同政治集团的成员,分别来自叙利亚的共产主义行动党(Communist Action Party)、伊拉克的达瓦党(Islamic Dawa Party)、也门的全国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以及突尼斯的伊斯兰倾向运动(Mouvement de La Tendance Islamique)。上述国家的政治犯人数在过去的十年里就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从主要的伊斯兰信徒到那些左翼成员,以及各国的共产党。这已经成为像埃及、叙利亚、约旦和突尼斯这些国家的基本模式。当然,在这些政权的监狱里同时还关押着各种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

许多政治犯是在经过不公正审判后被宣判的;其他一些人则遭到行政拘押,有的拘押时间长达数年而不被起诉;还有一些人则是无罪遭拘押或是遭拘押而不被审判,以及超期服刑或绕过相关法律框架办案。在有些案子的审判中,嫌疑人的亲属甚至会遭到逮捕,以取代“想要的人”(wanted persons)。

在过去的十年里,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总体趋势,然而,在中东地区却不是这样。在那里,所有国家在法律上都保留着死刑条款,许多国家还执行死刑判决。在其他国家如突尼斯、摩洛哥、也门和利比亚,虽然一直都存在着鼓励限制使用死刑判决的迹象,但要达到废除死刑的目标还不切实际。在伊朗,过去的十年里,有数千例死刑判决得到执行。被执行死刑的人中,很多是现政权的政治反对派,其中的许多人是由于非暴力的政治或宗教信仰而遭秘密审判和处决的。在其他一些国家,因为被判犯有谋杀罪、贩毒或吸毒、对政府的武装反抗而判处政治对手有罪等遭杀害的现象普遍存在。在伊拉克,上世纪 80 年代,每年都有上千例死刑判决宣判。由于存在大范围的刑事犯罪和政治运动,死刑作为一种可选择的强制性惩罚手段被保留了下来。受害者中甚至包括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1993 年,在这个地区,有 13 个国家的至少 350 人遭死刑判决,执行手段包括绞死、行刑队枪决以及其他手段。在中东地区,死刑判决具有可溯性,以作为不公正审判后采取政治压制的手段。

二

以上是过去十年或稍长一些时间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一些案例。是哪个国家发生了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又是哪个国家最尊重人权呢?当然,中东地区有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更系统地侵犯人权,但人权组织竭力避免为侵犯人权的事件制订系统的定性目录。人们怎么能对一个频繁处决其公民数以千计的国家,与另一个折磨其公民数以万计并投入监狱的国家作出评估呢?将“失踪”人员与“法外处决”人员作比较又会是怎样的呢?另一场关于为什么不制定一份关于侵犯人权的黑名单的争论,是当把显而易见的“候选人”提到案头的时候。那些处于不太明显的位置或被忽视的人士可能是更加容易“接受”的对象。这些黑名单上“可以接受”的面孔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当有人试图把(不同国家的)人权状况——例如,伊拉克的与英国的,或者叙利

亚的与法国的——作比较,那将是一场危险的争论。人们应该使用一种国际的或世界的标准,并适用于所有国家。在过去的十年里,以色列官员不止一次引以为荣地试图将以色列及其占领区的人权状况与它的邻国——例如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所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对比,更不用说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作比较了。国际舆论不会通过把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作比较,而是它怎样妨碍国际人权标准,包括《国际人权宣言》及其后颁布的主要人权公约,从而对其人权纪录做出评价。

至此,回顾中东地区的人权状况还有一些基本特征值得考虑。当然,在描述这个地区人权状况或者特征方面,应该谨慎使用诸如“常见”或“普遍存在”这样的字眼。在过去的十年里,西方评论家在描述该地区时经常使用诸如“恐怖主义”、“狂热”或“原教旨主义者”之类的负面词汇。这个地区培育了萨达姆·侯赛因、卡扎菲和阿亚图拉·霍梅尼等人及相关组织,这些词汇因而在西方国家频繁出现。是这个地区出现的黎巴嫩“西方人质事件”占据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新闻媒体头版或头条的位置。随着作家萨勒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因发表《撒旦诗篇》而遭(伊朗)死刑追杀结束了这个时代,但 90 年代又在伊拉克的“人体盾牌”事件中开始了。在描述中东地区(的人权状况)时,这种感性的和过于武断的语言常常阻碍人们对事情真相的争论失去理智。

了解中东地区真实状况的人们都承认,这个地区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结构多样的实体。这个地区有不同的宗教、民族、语言和文化,有君主立宪制政体和共和制政体;有军人政府和民选政府,有伊斯兰国家和世俗国家,直到最近还存在着亲苏国家(包括像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亲美国家。就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一般主题而言,忽视这些差异将是缺乏短见的。

在保护公民权利和个人权利方面,即便忽视一种这样的差异,在进入司法程序时,也会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差别。对这个地区多数国家宪法的简要描述会发现——至少在文字层面会发现——像言论和结社自由这种公民的基本权利仅仅是文件的规定而已。然而,眼前的现实却通常是另一回事。一个这样的例子就够了:叙利亚的 1973 年宪法保证其公民享有得到国际认可的一系列基本人权和自由。这部宪法保障其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权,国家保护公民自由、人格和安全(第 25 条);被告在被法院宣布有罪前是清白的,法律禁止对其进行折磨和随意拘押,依法保障被告通过辩护律师申辩的权利(第 27 条)。这部宪法保障公民在宗教信仰(第 35 条)、结社(第 39 条)、言论(第 38 条)和行动(第 33 条)等方面的自由。然而,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任何叙利亚公民都有可能遭到逮捕或拘押。已有数以万计的叙利亚公民,包括对政府进行非暴力批评的人士,遭到逮捕并在不受指控和起诉的情况下被无限期地“预防性拘押”下去。许多人遭受折磨,成了“失踪者”或被杀害。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许多国家的政党和工会的活动要么被完全禁止,要么就是被严格限制。例如,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约旦法律都不允许政党存在,所有政党都是在 1957 年被解散的。对政党活动进行限制可以通过制定像刑法典或其他法律的正常的立法程序实施。这些限制更常见的是滥用紧急立法或特殊立法的结果。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实施紧急立法或特殊立法是习以为常的。

在中东,最近十年还是不平静的十年。阿以之间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冲突持续几十年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 80 年代演变为一场起义,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地带公开示威反对以色列的占领。我们还见证了旷日长久的两伊战争以及最近的海湾战争(幸亏时间不长)、黎巴嫩内战、摩洛哥—西撒哈拉冲突、伊拉克—库尔德冲突。还有一些以国家为一方、持续时间不长的国内武装冲突,例如,叙利亚与穆斯林兄弟会(al - Ikhwān al - Muslimūn)之间从 80 年代初开始的冲突,以及 1986 年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内战和 1994 年开始的也门内战。

在这个地区,各国政府利用这种国内外的武装冲突作为推行紧急立法的口实,这使得各国可以随意中止公民的基本自由,压制任何形式的政治反对派。例如,通过实施紧急状态法、戒严法、封锁法等,赋予了行政当局超越司法机关的权力。在约旦,通过 1939 年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和 1967 年通过的戒严法,一套实施紧急状态的双重体系得以有效建立。这些法律条文使得约旦历届政府能够强有力地控制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多数领域。权力的行使基本不受司法系统的监督。叙利亚从 1963 年就开始实施紧急状态法,一直沿用至今。埃及 1967 年颁布的紧急状态法至今还或多或少地在实施。这部法律赋予埃及内政部不经控告和审判程序就能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公民实施行政拘留,以及对释放在押政治犯超越司法裁决的权力。

该地区各国政府已经建立起两种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名义对政治反对派频繁地进行压制的方法。第一种是在辩护期间不经过指控和审判就拘押政敌,这种拘押可以定期延长,也可以无限期执行下去。这通常被称作行政拘留,或预防性拘押。第二种是将被告送上特别法庭审判,例如紧急状态法法庭、戒严法法庭、革命法庭或军事法庭等。在这里,被告的辩护权受到限制。被告没有提起上诉的权利,审判时间也总是大大短于确保审判公正的国际标准。实际上,这个地区的几乎每个国家都使用这些方法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如果不是同时使用两种的话——来控制非暴力的政治反抗。从以上事实足以得出,许多国家的司法独立被大大限制,甚至有些国家,例如叙利亚、利比亚和苏丹的律师会发现,他们不能以从事独立职业的身份开展工作。

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各种不同类型的安全力量成员持续侵犯人权却免于受到惩处。以摩洛哥为例,国家从未对过去发生的虐待行为进行调查,尽管有一些长期被关押的政治犯,包括一些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经审判后投进监狱的政治犯得到释放;尽管有上千名“失踪者”在单独关押后重又现身;以及尽管有报道指出,至少有 30 名犯人在 Tazmamart 秘密监狱遭受折磨和因恶劣的拘押条件致死后,其他人得到了释放。在叙利亚,情形相差无几,虽然到 1991 年底有 2000 多名政治犯获释。即使政府采取步骤启动了调查程序,但他们一直不愿意公开执行(判决),或者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因此破坏了试图制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所做调查的效果。在突尼斯,1990 年成立了一个调查侵犯人权的委员会,但最后的全部调查结果从未公之于众,肇事者的姓名和犯罪行为公众也不得而知。在阿尔及利亚,1988 年当局承认,许多当年遭到拘押的人被折磨,并为受害者提供赔偿,但那

些实施酷刑的人从来就没有得到审判和惩处。

在任何地方,暴力的政治压制会导致暴力的政治反抗,这在中东地区也不例外。该地区各国政府经常由于他们的对手使用暴力而以此作为他们侵犯人权的理由。这种持续的暴力循环不仅影响到了少数族裔,还导致了政治抵抗运动。许多研究证实,对伊斯兰集团的武力手段采取相应措施会导致持续的趋势,但这类集团绝不是被迫采取武力反抗的唯一群体。毕竟《国际人权宣言》在其序言中就已预见到如下情形:人们将“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抗”。通过对中东地区过去十年来持续依赖暴力的检验,不管这种预见多么富有正义,在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里规定的基本人权,在这样的冲突中都经常遭到践踏。

在中东地区,所有国家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伊斯兰,忽视这一点,对该地区人权状况的评述将是不全面的。囿于篇幅,在此没有机会对穆斯林世界正在进行的关于伊斯兰与世界人权的争论作恰当的判定。关于这一点已有不少著作问世,多数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然而,有几个因素对人权状况产生直接的影响。首先是该地区各国政府在推行伊斯兰教和伊斯兰观以使其统治或压制反对力量合法化方面的机会主义。这在尼梅里统治下的苏丹最为明显,当时为压制政治对手,使用了包括像截肢、笞刑和死刑在内的罕见的惩罚手段。对尼梅里泛伊斯兰化政策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反对伊斯兰或文化敏感性的缺失。而且,多数苏丹人拒绝接受这项政策,因为它既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也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各国政府还试图以伊斯兰教为其拒绝接受国际人权标准辩解,这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在许多方面,同样还是这些政府又准备接受国际法以使其成为或继续成为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的国际条约的缔约国。实际上,只有沙特阿拉伯保持了两方面一致,它拒绝参加所有这类条约和国际公约。

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一股反对极权和专制政权的普遍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然而,只有那些表明不能容忍民主自由并为之而战斗的政权,才可能被成功推翻。阿尔及利亚的军人政权和该地区的阿拉伯知识分子阶层一直争辩说,民主是通过投票箱把关键人物推上权力宝座的冒险。不幸的是,这么做强化了某些伊斯兰教徒——并非所有人——的一种信念:变革只能通过暴力,而不是民主进程获得。

三

表面看来,过去十年来中东地区人权状况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实际上,该地区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改变。80年代见证了当地人权运动的进步。几乎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开始表达他们执着的信念。他们认为,造成该地区当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民主的缺失。各国政府也开始表露出他们已意识到来自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压力,并且要有所回应。有些国家已经对国家机构作出调整,并通过改革减轻这种压力。

巴勒斯坦起义不仅被认为是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斗争,还是启示许多国家进行变革的先声。在 1987 年底,本·阿里总统在突尼斯一上台,很快就释放了将近 2500 名政治犯,并撤销了国家安全法庭。1988 年,卡扎菲上校释放了 400 名政治犯,并提议实行包括废除死刑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虽然在那个时候要废除死刑被证明是很困难的,但所有当时的死刑案例都被减刑,死刑的范围也被限制。在同一年,黎巴嫩人民大会废除了“肉体清算”的政策,利比亚批准了《联合国酷刑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在阿尔及利亚,继因 1988 年 10 月起义而开始实施血腥镇压之后,本·杰迪德·沙德利总统感受到了压力,开始实行改革,并颁布了新宪法,国家安全法庭被撤销,法律允许组建新的政党,而这在阿尔及利亚自 1962 年独立以来一直是被禁止的。在约旦,继骚乱和广泛要求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呼声之后,1989 年年底举行了 22 年来的第一届全国议会选举。新政府释放了政治犯,冻结了戒严法。在科威特,在遭(伊拉克)入侵以前,成千上万的科威特人每周都参加集会,要求重新实行民主,恢复 1986 年遭解散的议会。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在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合并之前经历了自己的痛楚。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出人意料地在 1991 年释放了上千名政治犯和“失踪的”撒哈拉人。伊朗也最终同意联合国特别代表于 1990 年访伊。

还能列举一些(该地区)发生积极变化的例子。当然,进步总是会遇到挫折的。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随后发生的暴力事件。这场战争对该地区人权的影响从摩洛哥到伊朗都能感受到。沙特阿拉伯驱逐了也门的工人,由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那里的民主试验受到了威胁。约旦发生了改革进程中的显著倒退,同样是因为约旦在战争中的位置使其经济受到了影响。突尼斯在西方的威信大跌,其旅游业遭受了戏剧性的打击,这使它的收入急剧减少。

在随后的海湾战争中,有些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前就存在,并因受苏东剧变影响而极度兴奋的情绪消失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加大了遏制的力度,特别是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反对派。然而,这种倒退仅仅是暂时的,不可能阻止在这个地区推广开了的改革趋势。最近几年,改革的根基已定。今天,没有哪个政府能对无论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的对自己人权纪录的批评,以及要求为避免对未来暴力行为落实更多保护责任的压力产生免疫力。他们对于这些挑战将如何回应,还有待继续观察。